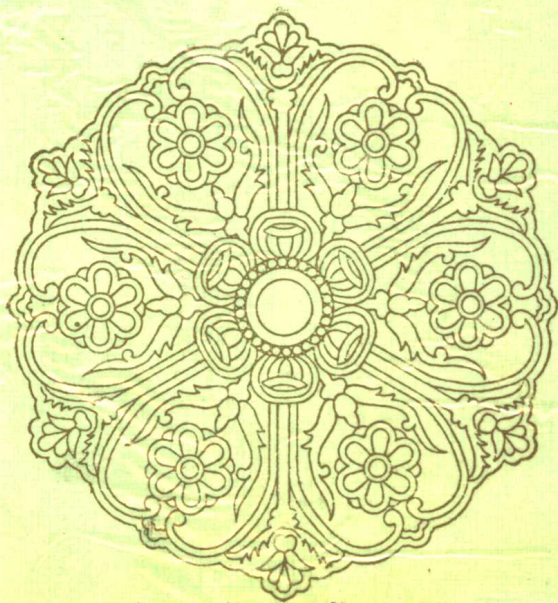


水浒研究 论文集

沈伯俊编



中华书局

水 浒 研 究 论 文 集

沈 伯 俊 编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王景桐

水浒研究论文集

SHUIHU YANJIU LUNWENJI

沈伯俊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新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2 $\frac{1}{2}$ 印张·526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21.00元

ISBN 7-101-00459-8/1·70

前 言

《水浒》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不仅与《三国演义》同为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而且是“英雄传奇”类长篇小说中最成功的一部。它以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生动感人的艺术形式，与《三国演义》共同形成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六百多年来，它在我国人民中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历程的一段精彩的艺术写照，它不仅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而且具有长远的研究价值。

建国以来，《水浒》研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1949—1966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亿万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崭新的历史条件，使得《水浒》这样一部深刻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的古典名著，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在此前后，学者们发表了数十篇《水浒》研究文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等单位还组织了对《水浒》的专题研究。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水浒全传》，进一步推动了《水浒》研究的发展。在党中央

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五十年代的《水浒》研究一直比较活跃。在此期间出版的研究专著、专书有八种，即：黄裳的《论水游戏及其他》，江树峰的《水浒的好处》，何满子的《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何心的《水浒研究》，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柳的《水浒人物论》，严敦易的《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水浒研究论文集》；发表的研究论文达二百多篇。

五十年代《水浒》研究的突出特点是，许多研究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认识《水浒》。如冯雪峰在《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一文中^①，就根据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基本原理，充分肯定了《水浒》的真实性：

“我们根据历史去判断，就会觉得《水浒》所描写的北宋末年的社会生活是非常真实的。它作为一部描写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书来看，从它的根本精神上说，有其极高度的真实性。主要的是它大胆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创造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中的英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正义的斗争和思想。这些人物，从宋江到时迁，他们的斗争和性格，作为典型看，在北宋末年或接近北宋末年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在农民起义中，是使人无可置疑地真实的。”当然，在某些论著中也还存在着简单化、生搬硬套的现象。

六十年代前期，在《水浒》研究的指导思想方面开始出现差异。一方面，一部分作者继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研究，使研究又有所深入。此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②，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③相继

① 原载《文艺报》1954年第3、5、6、9、11期，收入《冯雪峰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② 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

③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

问世,分别对《水浒》的成书过程、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和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另一方面,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乱扣政治帽子的不良作风,在少数论著中也有所抬头。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一百多篇《水浒》研究论文,但越到后来论文越少,以至1966年上半年只有一篇文章问世。

(2) 1966—1976年

十年动乱时期,我国的学术事业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当大批知识分子惨遭打击迫害之时,已无学术研究可言。后来在“评《水浒》”运动中,虽然也出版几十本小册子,产生了千余篇文章,但与《水浒》研究关系不大,缺乏学术价值,这里不作论列。

(3) 1976年以后

1976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水浒》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广大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使整个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队伍迅速壮大。许多老专家焕发青春,发表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论著。更多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以其勃发的生气和锐敏的见解而引人注目。1981年以来,举行了三届全国性的《水浒》讨论会,研究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学术大交流。

第二,研究成果显著增加。1977年至本文写作之时,已经出版《水浒》研究专书共十三种,即:张国光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①,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新议》^②,郑公盾的《水浒传论文集》^③,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主办的《水浒争鸣》第一至三辑^④,湖北省《水浒》研究会和《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合编的《水浒争

① 中州书画社1981年9月第1版。

② 重庆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③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④ 长江文艺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4月、1983年8月、1984年1月出版。

鸣特辑》^①，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施耐庵研究》^②；汪远平的《水浒艺术探胜》^③，吴士余的《水浒艺术探微》^④，林文山的《水浒简评》^⑤，《水浒争鸣》第四辑^⑥和马蹄疾编著的《水浒传书录》^⑦等。这个时期发表论文约七百篇，其数量大大超过了1966年以前十七年的总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都大大发展了一步。

第三，研究水平有所提高。随着思想的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加强，研究者们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开阔了，对作品的审视也更为深入。如人物形象研究，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从一般社会政治的角度去分析梁山好汉们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而是进一步剖析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结构层次，揭示其美学价值。唐富龄的《宋江形象的分裂性、统一性及其他》^⑧，陈周昌的《宋江性格结构试探》^⑨，对宋江形象的分析就较前深入了一步。汪远平则从“形神兼备，传神写照”，“抑扬映带，起伏交错”，“人事融合，闲闲渐写”，“虚实相生，语近情遥”，“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妍媸必露，清浊必闻”等各个方面，对《水浒》人物描写艺术的整体作了全面的分析^⑩。对《水浒》艺术成就的认识，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而近几年来，不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更为细致，而且还扩大了研究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吴士余对《水浒》的形象结构、蒙太奇处理、人物出场处理、戏剧因素的分析^⑪，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① 1983年8月以《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增刊形式出版。

②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

③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④ 重庆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⑤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⑥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

⑧⑨ 均载《水浒争鸣》第一辑。

⑩ 见其所著《水浒艺术探胜》一书。

⑪ 见其所著《水浒艺术探微》一书。

总之,三十多年来的《水浒》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中,其受重视的程度,研究的实力和水平,都仅次于《红楼梦》研究。

二

建国以来的《水浒》研究,有些问题已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但不少问题还存在着热烈的争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五个问题。

(1) 关于《水浒》的作者

明代以来,对《水浒》的作者有“罗贯中编”、“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施作罗续”、“施耐庵作”等记载。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其意谓《水浒》作者为罗贯中。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更明确提出:“罗贯中荟萃诸说或小本‘水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浒传》。”建国以来,学者们对此争论热烈,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水浒》作者是施耐庵。这是金圣叹评改本《水浒》行世以来最流行的观点。建国以来的大多数论著均主此说。其根据主要有二:一是从思想倾向来看,《三国演义》对黄巾起义持反对态度,而《水浒》则歌颂了梁山农民起义,两者倾向牴牾;二是从语言风格来看,《三国演义》用浅近文言写成,而《水浒》用流畅的白话写成,因此,两者不可能都出自罗贯中一人之手。

第二种认为《水浒》作者是罗贯中。王晓家《〈水浒传〉作者系罗贯中考辨》认为^①:“历史上不存在‘施耐庵’其人”,“《三

^① 王文载《水浒争鸣》第二辑。

《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出于同一人手笔,即都由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创作于前,《水浒传》创作于后,表现了作者世界观上的变化和创作上的成熟”。罗尔纲在《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中¹,将《三遂平妖传》与容与堂刻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加以对勘,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两书都同为罗贯中所著”,“《三遂平妖传》全书赞词仅二十一篇,就有十三篇插入《水浒传》中十五处去。这个事实表明只有同一人的著作才会如此”。其二,“罗贯中把《三遂平妖传》的赞词十三篇,分别插入《水浒传》第一回至六十二回共十五处,全部都是在明容与堂刻百回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前……这个事实,表明了《忠义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并不是罗贯中所著,而是他人续加的”。周维衍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考证,认为:“《水浒传》最后成书必是在明初,更具体地说,当在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不可能在洪武十年以后”,“《水浒传》的最后成书者是罗贯中”²。

第三种认为《水浒》的著作权应由施耐庵、罗贯中共享。刘冬、欧阳健认为:“施耐庵即繁本《水浒》的完成者,而罗贯中则是施耐庵的协助者。两人对于《水浒》的问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在编纂出版方面,罗贯中的贡献可能还要多些。”³王利器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一文中认为⁴:“《水浒全传》的编纂过程,大概是施、罗二人通力合作的,所以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他们所根据的底本,大致有三种:一是以梁山泊故事为主的本子,二是以太行山故事为主的本子,三是以述及方腊故事的施耐庵‘的本’”,“施耐庵就是施惠”,“《水浒全传》当成书于

1 罗文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

2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

3 有关《水浒》、施耐庵及罗贯中的几项新发现材料述评,见《施耐庵研究》。

4 王文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元时”。黄霖在《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一文中¹，赞同王利器关于“为《靖康稗史》七种作序的耐庵是施耐庵”的观点，认为施耐庵是宋末元初人，并认为明代吴从先所读的《水浒》古本“完全有可能就是那种久已失传的‘施耐庵的本’”。他还认为：“施耐庵虽是今知《水浒》作者的‘始祖’，但他只是将当时流传的《水浒》故事简单地编集、联缀成一本而已……《水浒》最后在文学史上大放光彩，就完全离不开罗贯中、郭勋（？）等人不断的、全面的加工。因此，我们今天假如将《水浒》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名下，实在是极不公平的。”

第四种认为《水浒》是郭勋或其门客托名施耐庵所作。戴不凡在《疑施耐庵即郭勋》一文中²，认为：“郭本是《水浒传》小说的最早刻本”，“施耐庵其实并无其人，极可能就是郭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张国光的《〈水浒〉祖本探考》进一步认为³：“《水浒》非宋元或明嘉靖以前作品”，“郭刻本就是《水浒》最早的刻本，它其实就是郭勋的门客执笔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年，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初”，“郭勋等编成《忠义水浒传》一百回后，为了抬高书的声价，就把写作的时间拉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的宋元时代，为此又在罗贯中之外虚构了一个施耐庵”。

（2）关于施耐庵的生平史料

1952年，刘冬、黄清江的《施耐庵与〈水浒传〉》，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同时在《文艺报》是年第二十一期发表，认为施耐庵即元末明初苏北白驹人施彦端。当时虽有一些文章赞同此说，但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后来，丁正华又发表《施耐庵为兴化施族祖先应非假托辩》一文⁴，仍未引起什么反响。直

1 黄文载《复旦学报》1982年第5期。

2 见其所著《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3 张文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

4 丁文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5期。

到1980年,刘冬发表《施耐庵生平探考》^①,江苏大丰、兴化两县为筹建施耐庵纪念馆而大规模地征集施耐庵文物史料,争论才热烈展开。对于已经发现的文物史料,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是基本肯定。1982年4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兴化、大丰召开了“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谈会”,到会十几位专家发表了《考察报告》^②,认为新发现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江苏省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这位施彦端与新发现的民国七年过录载有乾隆四十二年序的《施氏长门谱》所记施以谦之父‘彦端公字耐庵’的‘彦端’相符。因此结合以往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民间传说,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说:‘(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等语与明代早期目录书中的著录、明清笔记所记以及《水浒》刻本所题《水浒传》的作者为‘钱塘施耐庵’、‘武林施某’,年代与地望亦均吻合”。这次座谈会前后,张惠仁、欧阳健、王同书、周健民、卢兴基、王春瑜、李灵年等许多作者发表文章,对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持肯定态度,而肯定的程度有所不同。如何满子认为:“所谓王道生《墓志》,不论内容、文体,都漏洞百出,矛盾重重。”但“以出土文物为依据,核对书面材料,可以肯定元末明初,在江苏省兴化县白驹场(白驹今属江苏大丰县)确有一位施某,当时曾经流寓浙江,其年代和地望,和明人所记载的‘元人施某’、‘钱塘施耐庵’等语相吻合,使施耐庵之谜可以较接近于揭开谜底”^③。章培恒仔细辨析了《施氏家簿谱》的真伪,特别是对谱中“彦端公”右旁下侧小字书写的“字

① 刘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

② 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4期。

③ 《施耐庵之谜》,载198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耐庵”三字作了深入推敲，结合《故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认为：“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今天可以承认施彦端即施耐庵。但是，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兴化县续志》中的伪造材料，抄本《施氏族谱》中窜入的文句，全部应该摒弃。”^①而有的研究者则趋向于全盘肯定这些文物史料。

第二是主张存疑。1982年8月，首都学术界部分人士举行“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到会的多数学者认为，新发现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等文物史料本身是真的，但要由此得出施彦端就是《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结论，尚嫌根据不足；应该继续调查，收集材料，进行研究，不必急于下结论。在是年十一月于武汉举行的1982年《水浒》学术年会上，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对江苏新发现的文物史料姑且存疑。在这两次会议前后，一些学者撰文发表了存疑的观点。其中，刘世德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具有代表性^②，文章详尽分析了有关施耐庵的史料，提出了十五点结论，主要有：“民国《兴化县续志》中的关于施耐庵的材料（包括施耐庵小传、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等），支伟成、任致远《吴王张士诚载记》一书所引录的袁吉人《耐庵小史》，时间晚近，来源不详，内容可疑，如果作为考索施耐庵生平的本证，是无法令人首肯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本身的文字不能证明施彦端即施耐庵”，“《施氏家簿谱》世系中的‘字耐庵’和‘元朝辛未科进士’十个字，极为可疑。它们非原文所有，而是后添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真实可靠的、能排斥任何反证的文物、史料可以证明施彦端即《水浒》作者施耐庵”。

第三是根本否定。张国光在《〈水浒〉祖本探考》中写道：“施耐庵只是《水浒》原作者的托名，因此我认为对施耐庵生平的调查、

① 《施彦端是否施耐庵》，载《复旦学报》1982年第6期。

② 刘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探考活动都是难有预期结果的。”在《鲁迅的“施耐庵”为繁本〈水浒〉作者之托名说无可置疑》一文中^①，他再次强调，关于施耐庵的墓志、家谱、诗文、传说“俱难征信”。黄霖也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揭示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兴化、大丰的始祖为施彦端，而不是施耐庵。”“兴化、大丰在元末明初压根儿没有一个施耐庵”^②。

（3）关于《水浒》的版本演变

主要涉及繁本和简本孰先孰后的问题。有三种观点：

一种是“由简入繁”说。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来，比较多的人认为简本在前，繁本在后。何心《水浒研究》认为：“百十五回简本乃是现存各本中成立最早的本子，因为它最接近原本。”他举出的主要证据有三：其一，百十五回本的回目，与繁本比较，显得拙劣幼稚。如果繁本在前，便决不会如此。其二，“百十五回本叙述任何人讲话，都用‘曰’字”，而“各繁本则都用‘道’字，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个别地方还保留着‘曰’字，七十回本也都改为‘道’字了，这是由简到繁逐步更改的痕迹。”其三，“百十五回本虽是简本，有几处文字却反比各繁本为多”，“可见百十五回本实是原文，繁本在这些地方倒反而经过删节了”。聂绀弩《论〈水浒〉的繁本和简本》则认为^③：“简本在先，繁本在后，繁本由简本加工而来。”他还指出：“繁本出于简本，也并非说老百回本出于现存的某一个简本。繁本所据以加工的那种简本，可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也可说现在还未发现。那种简本当是嘉靖以前的、和一切有年代可考的现存简本的祖本或祖本的祖本而且又高于它们的一种本子。”

① 张文载《水浒争鸣》第一辑。

② 《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

③ 聂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一种是“删繁为简”说。自孙楷第在三十年代提出简本系由繁本删节而成以来,一些学者对此说有所论述。王根林的《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一文^①,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繁本《天都外臣序本》(简称《百回本》)与现存最早的简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简称《评林本》)加以比较,“发现《评林本》是当时书坊庸贾为牟取利润而将《百回本》删节而成。由于在删节时粗制滥造,故书中保存着许多脱胎于繁本的痕迹”。文章还指出,百十五回简本晚于《评林本》,不应以它为依据来论证繁本与简本的先后关系。张国光的《鲁迅以来盛行的〈水浒〉简本“加工”为繁本说的再讨论》一文^②,追溯了由简到繁论和删繁成简论这两派的源流及其基本论据,也认为简本系由繁本删节而成。

一种是“简繁相互递嬗”说。欧阳健认为:“只有以辩证的观点把《水浒》不同形态的版本之间的关系看成为一个密切相关而又相互递嬗的发展过程”,才能对版本的演变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阐述。他认为,《水浒》的简本和繁本的相互递嬗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有田、王而无辽国”之简本发展为“去田、王而加辽国”之繁本;第二阶段,由“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繁本删节为“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简本;第三阶段,在“添加改造后的田、王”之繁本产生前后,出现了“插增旧本田、王部分”之简本^③。

(4) 关于《水浒》的主题

对《水浒》主题的分析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农民起义”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先出现,而且始终居

① 王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② 见其所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

③ 《〈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载《文史》第15辑。

于支配地位的观点。如路工认为:《水浒》“集中地、细致地、生动地描绘了农民革命战争”;“《水浒》所以是一部不朽的作品,正因为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官僚阶级的矛盾,歌颂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革命英雄,暴露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官僚、恶霸地主。”^①冯雪峰则从文艺理论的高度,运用真实性和典型性的观点,指出:《水浒》“以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为主题,以宋江等英雄人物为主干,全面地描写了中国中世纪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深刻地、大胆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描写了农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力量和革命思想,反映了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希望,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革命思想的不彻底性和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缺点,等等。”^②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农民起义”说。

第二,“忠奸斗争”说。近几年来,一部分学者持此观点。如刘烈茂认为:“贯串《水浒》全书的并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是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它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替天行道’;它所着力歌颂的理想人物并不是晁盖、方腊那样的农民起义英雄,而是宋江那样的忠义之士。”^③孙一珍认为:“从百回本的《水浒传》全书着眼,它所写的是亡国之君宋徽宗统治时期,蔡京、高俅等贪官、奸佞、权贵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包含着强暴对弱小的欺压,奸佞对忠良的排挤,邪恶对正直的陷害。”梁山英雄身上“集中地概括了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具有的诸如反压迫、反侵略等优秀品质”,而宋江则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全忠仗义的典型形象,也是当时人民群众理想中反奸抗暴的英雄。”^④

① 《〈水浒〉——英雄的史诗》,载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

② 《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

③ 《评〈水浒〉应该怎样一分为二?》,载《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④ 《〈水浒传〉主题辨》,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第三,“为市民写心”说。1975年,伊永文发表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①,指出在《水浒传》中,“大批的非农民化人物成了主人公”;“《水浒传》中的起义军没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水浒传》这部小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事件为原始素材,根据市民阶层的理想,着重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反抗思想和行为,并且描写了市民阶层和某些农民出身的人物‘逼上梁山’的情景,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自1980年起,欧阳健、萧相恺连续发表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市民”说。他们从《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不同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水浒》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农民、《水浒》中的“替天行道”并非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水浒》中梁山泊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四个方面去考察,认为:“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或作品的艺术效果看,《水浒》都不曾把梁山泊聚义写成真正的农民起义。他们不过是借农民起义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而把它写成了表现市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基本上是以绿林豪侠为主体的小说”^②。对这种观点,有人赞同,也有人辩驳。

(5) 关于金圣叹对《水浒》的评改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涉及金圣叹的思想,金圣叹评改《水浒》的动机、功过,金圣叹的艺术观及其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美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这个问题上两度出现争论的热潮;尤其是近几年,作为《水浒》研究的热门课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较大进展。总的说来,过去那种简单化地把金圣叹斥为“封建反动文人”,低估乃至否定其艺术贡献的倾向已经基本改变;大多数研究者对金圣

^① 伊永文载《天津师院学报》1975年第4期。

^② 《〈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载《钟山文艺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叹评改《水浒》的艺术成就及其艺术观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金圣叹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杰出的理论家。但是,学术争鸣并没有停息,而是在新的水平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对张国光提出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金圣叹是古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等观点,各种意见的分歧还相当大。限于篇幅,这里姑不多作论列。

综观建国以来的《水浒》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研究日益兴旺的景象,也可以感到研究确有一定的难度。正是在不同观点的争鸣中,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正在酝酿之中。

为了适应广大《水浒》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需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新中国《水浒》研究的概貌,我们选编了这部《〈水浒〉研究论文集》。由于《水浒》研究涉及面广,佳作甚多,而选集的篇幅有限,我们在选文时,颇费斟酌,遗珠之憾,时时萦怀;加之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术界同行批评指正。

沈伯俊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成都